

評析《自由中國》雜誌對戰後初期救國團 教育 (1952-60) 之論述

張淑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 要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於 1952 年成立，為戰後初期國民黨執行黨化教育的重心，其設立與實施的過程備受社會爭議。而《自由中國》雜誌集結了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改革觀點，從 1952-60 年之間強烈批判救國團教育違反民主教育、浪費公帑以及實施不當的軍訓課程等諸種弊端。本文欲分析《自由中國》中多篇對救國團教育的批判觀點，並從台灣教育史的脈絡探查其意義及影響。

關鍵詞：救國團、自由中國、軍訓課程

壹、緒論

《自由中國》為台灣 195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論雜誌，於 1949 年 11 月 20 日創刊。創刊之初原本期待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在台灣實施民主憲政，以和對岸的共產政權相抗衡，然而該刊物因批判若干蔣介石獨裁以及不尊重言論自由的措施，引發其不滿，導致負責人雷震於 1955 年初遭到撤銷黨籍的處分，且於 1960 年 9 月 4 日被捕；而雷震被捕後，《自由中國》也被迫停刊（薛化元，1996a：4）。

台灣黨國威權體制的成形與鞏固可說在 1950 年代，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支配了整個台灣各層面的發展。在政治上限制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與參政權；在經濟上控管了經濟活動與市場行為；在社會上壓制了人民團體與社會運動；在文化上則是形塑與掌控教育、意識形態與傳播系統，《自由中國》從各方面提出批判性的觀點與建言，此刊可說是戰後來自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改革觀點的集結（薛化元，1996a：8；潘光哲，2003：xii）。關於教育上的批判，主要集中在黨化教育以及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下簡稱救國團）的教育。本文將論述焦點置於救國團教育，因為它是戰後初期國民黨執行黨化教育的重心。

關於《自由中國》的相關研究，大多著眼於其對國民黨主導的政治體制與政策所進行的分析（魏誠，1984；顏淑芳，1989；薛化元，1996a；1996b；1996c），針對《自由中國》對教育議題的批判，僅有薛化元（1996）與林淇濂（2005）的研究中觸及：前者在 1996 年出版的《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一書中，以第五章第二節的部分評析黨化教育以及救國團的活動；後者則摘錄《自由中國》的文章，用來論述國民黨如何對媒體與言論自由兩方面進行控制。兩篇研究因篇幅有限，僅從《自由中國》的角度批判救國團的成立與運作，但是對於救國團教育的發展並未說明；再者，兩篇的焦點並不在救國團教育，所以未能全面針對《自由中國》刊物中各篇對於救國團的批判採取脈絡性的分析，而且在評析上較缺乏教育的觀點。因而本文的論述一方面欲加強救國團發展背景的介紹，最重要的是進行全面性評析，嘗試補足先前相關研究較未觸及的教育觀點。研究者想從教育的視野來看

待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救國團教育，所關切的是《自由中國》的教育批判是否有留下什麼對教育的影響？再者，這群自由主義者帶著什麼樣的教育前提批判當時的救國團教育？

救國團於 1952 年成立，《自由中國》從 1949 年創刊到 1960 年停刊，兩者在 1952-1960 年之間重疊，形成本文的論述時空。在行文上，第一部分先對戰後初期救國團的成立背景進行了解，第二部份則論述『救國團的成立背景以及政策』；以之為基礎，第三部份再從《自由中國》的觀點對救國團教育進行批評，最後研究者從教育的觀點對戰後初期的救國團教育進行評析。

貳、救國團的成立背景以及政策

蔣介石深信國民政府在大陸慘敗乃是導因於青年教育的失敗，尤其三民主義教育思想的失敗（茅家琦，2003：213；郭紹儀，1988：216；賈嵩麓，1974：65；鍾聲，1984：146）。為了避免悲劇重演，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在 1950 年初展開了一連串的改革運動，企圖重建政治領袖的權威（王佩玲，2001：40；李偉松，2005：44）。1952 年 3 月 29 日的青年節，蔣介石發表告全國青年書，提出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號召，希望透過救國團的組織，以蔣經國為首的政工系統從事軍事化活動與政治化的宣導，企圖掌握中學以上青年學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意識型態（黃俊騰，1994：7）。5 月 31 日行政院頒佈臺教字第二五九二號訓令『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作為設立救國團的法源。並於同年 9 月 5 日在台灣北投復興崗開始籌備工作，經行政院直接定立台四一教之五二六五號訓令予以核準，同年 10 月 31 日在蔣總統的誕辰日正式成立，籌備成立僅短短一個多月，創下最短時間成立機構的紀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88：2-3；梁中銘，1954：287）。在救國團的『成立訓詞』中蔣介石總統指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66：5-6）。

- (一)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一個教育性的組織：國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更需要革命的教育，沒有革命的青年，國家就沒有充沛的生機和進步的

動力……。在本團教育和訓練的方針上，必須與國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一團員，必須在三民主義的最高指導原則及政府決策之下，加強革命信念，增進革命知識，學習工作方法，鍛鍊堅強體魄，使自己陶鑄為文武合一德術兼備的人才，以擔負反共抗俄救國救民的責任。

(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一個群眾性的組織：……本團目前乃以學校青年基本的組成份子，今後我們要從學校，擴展到整個社會，無論機關、團體、工廠、農場，一定要聯合青年，團結青年，來共同參加此一大時代反共抗俄讀戰鬥。同時在一個群眾性的組織中，必須養成明理尚義的德性，提高互助合作的精神，服從團體命令，嚴守革命紀律，才能發揮組織的力量，獲得工作的成效。

(三)中國青年救國團是一個戰鬥性的組織：我們過去在大陸上的失敗，是由於青年喪失了戰鬥的精神，離開了戰鬥生活。我們領悟了這種慘痛的教訓，必須提高戰鬥情緒、學習戰鬥技能、厲行勞動生活、加強服務熱忱，使全國青年在反共抗俄總動員的號召之下，進行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全面改造……。

上述的三項訓詞內容點出了救國團肩負著教育性、群眾性及戰鬥性的時代性任務，蔣介石希冀透過這三個主軸，讓救國團傳遞給青年正確的革命教育，團結青年凝聚反共抗俄的民族意識，更喚起青年的服務熱忱與戰鬥精神。

當時的聯合報以及中央日報每日均有學生熱烈響應加入救國團的相關報導。1952年12月1日台北市全體高中學生 9,500 人在台北市三軍球場共同宣示加入救國團，之後規定所有高中學生為當然成員(胡茹涵, 2005 : 278)。到了 1953 年年底，國內外加入救國團者已經破 10 萬人之多(梁中銘, 1954 : 287)。

在組織工作上，根據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88)出版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工作概況》指出，由中央設立總團部，台灣地區各個縣市、金門和各大專院校設有支隊，各地高級中等學校成立大隊，台灣省各縣市重要地區和馬祖則設有社會大隊。工作重點為學校軍訓、愛國教育、戰鬥訓練和服務活動四大部分，其中高中以上在校學生的軍訓課程和戰鬥訓練活動有賴軍方的支援和指導，因而救國團從成立之初即隸屬於國防部。

在軍訓課程的實施上，以 1953 年 7 月由行政院核定頒布的『台灣省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為依歸，其中要求全省各中等學校實施每週三小時的軍事訓練，課程的目標在於『鍛鍊學生健全體魄，灌輸現代軍事常識，陶冶犧牲奮鬥之高尚品格，養成蓬勃紀律生活習慣』。軍訓課程與訓導工作銜接，對學生的生活實施軍事化的管理，一方面要求體育活動國防化，加強體能與戰鬥技能的訓練，另一方面要求課外活動軍事化，男學生著重生產技能、勤勞習慣的養成以及和國防軍事有關的技能訓練，女學生加強戰爭時必要的護理勤務與訓練（胡茹涵，2005：280-81）。然而軍訓課程的實施在民間有不同的爭議，1960 年總團部（1988）提及「鑑於軍訓教育的實施已奠定基礎，為符合教育體制，乃奉核定將學校軍訓業務移請教育部接管」，此後由教育部繼續接管高中以上學校軍訓課之實施。

在愛國教育的實施上，又以『民族精神教育』稱之。以《三民主義體系及其實程序》、《反共抗俄基本論》、《中國之命運》以及《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等四部基本教材在學校進行。一方面由總團部供應資料給高中各以上學校，利用週會和月會舉行民族精神教育講話，此外更將上述教材納入國文、三民主義、公民、史地等課作為正式或補充教材，規定在學校先由大隊支隊逐級舉辦測驗，檢驗學生的閱讀吸收程度，每年底並舉行愛國教育測驗，獎勵成績優良者（芮和蒸，1982：48）。

戰鬥訓練則是從 1953 年起為了響應蔣介石總統「國家需要革命青年，青年需要革命教育」的口號，於每年暑假所辦理的活動。一直到 1961 年才改名為「青年訓練活動」，將青年活動的內容從戰鬥活動延伸至食衣住行育樂等多元層面，不再侷限於戰鬥性的範疇。這段時間戰鬥訓練的基本要求是到大自然中學習戰鬥技能，理解軍事精神，並從中養成青年互助、合作、勞動的價值觀，發揮青年報國救國的力量。在其中將戰鬥訓練融合了服務活動，不僅是讓青年上山下海學習各種軍事戰鬥技能，同時也帶領青年在各戰鬥訓練的活動中進行服務，發揮勞動創造的精神，進行持久而具體的服務工作（李建興，1982：6、23-24）。

綜合而論，救國團兼具教育性、群眾性與戰鬥性，透過由上而下模擬黨部的嚴密組織欲傳遞給高中以上青年學子愛國、愛領袖的意識，並培養

其戰鬥與服務的精神與技能，充分表露出救國團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組織。

叁、《自由中國》批判救國團的脈絡

1952 年 9 月 16 日自由中國刊出一篇題為〈對於我們教育的展望〉的社論中，對於正在籌備中的救國團組織提出建言，較含蓄的指出籌辦的人員不能是偏激的黨員，這篇文章一出，讓官方第一次禁止在軍中閱讀此一刊物（薛化元，1996a：104-105）。10 月 16 日徐復觀在《自由中國》中又接著發表〈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一文，指出救國團的成立並無法律基礎，貿然成立會破壞國家體制，其中所從事的『推行政令、整理戶籍、擔任教育、地方自治、土地行政』等工作，和原本專職的政府機構相衝突；另外國民黨與救國團的關係不清，學生並需額外進行許多救國團的工作會難以兼顧學業。最後他在文中建議，應把參與者區分為社會青年與在學青年兩部分，前者採取自願參加的方式，後者則應全體參加，以學校作為團的組織單位，而且限制救國團的活動不得妨礙正常的教育。為了讓救國團的運作正常化，徐復觀進一步建議由教育部長兼任救國團主任，領導學校青年，副主任則由國防部的政治部主任兼任，領導社會青年。根據雷震事後（1952 年 10 月 27 日）的日記表示（傅正，1990），徐復觀此文刊出後，引起蔣經國極大的不滿，他並未對徐的觀點直接表示意見，只是認為徐復觀對他有所不滿、認為他不配做團主任。儘管救國團的成立有所爭議，但是同年的 10 月 31 日救國團還是正式成立，當天蔣介石頒發救國團成立訓詞，三千名青年宣誓入團，並宣稱救國團的成立是全國青年第三次大結合的開始¹（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66：5；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69；1982a：1-2）。

¹ 先前的兩次分別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犧牲奮鬥，奠定了中華民國開國的基礎，完成全國統一，這一段中華民國光榮歷史，都是由於全國青年第一次大結合而成的；其次，反抗侵略，打倒強權，卒能獲得抗戰最後勝利，這是由於我們全國青年第二次大結合而成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1966：4-5）。

在救國團成立一年多之後，1954年《自由中國》刊載了一篇余燕人等人共同發表的〈搶救教育危機〉一篇讀者投書，批評救國團介入學校教育的現象，余文先是批評教育廳從1954年以來不斷以黨化教材（三民主義、總理遺教、總統訓辭、救國團出版的小冊子等等）舉行考試檢測學生的熟練度，加重學生無謂的學習負擔，此外，許多來自救國團的課外活動也是沉重的負荷（余燕人，1954：32）：

一個學生除了要參加與校內正常的課外活動之外，還要開分隊會議、小組討論、幹部會議，要上愛國課程，要練習大合唱，有時要去三軍球場維持秩序，有時要去中山堂開戰鬥晚會，有時要去展開各種募捐，有時要去勞軍，有時要去遊行……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最後的結論是在蔣總統實踐民主的意志下，我們應該實施一種自由而且正常的教育，如果實施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教育只是落入共產黨的後塵而已。這篇雖是讀者投書表達的意見，但是根據雷震1954年12月29日的日記中表示，蔣介石對此大怒，下令要開除雷震的黨籍，雖然當時雷震並未登記黨籍，可見蔣介石的憤怒。除此之外，此文刊出一個月後，出現一則回應的讀者投書，為北一女高二生張瑚玉所寫，其中提及救國團的成立鼓舞了三軍的士氣、也培養了學生的讀書風氣，增進學生與人民的愛國思想，這是眾所肯定的事實，同時並強烈指責余燕人等人的批評為無知與幼稚，完全不知只有瞭解中國國民黨的思想與理想才是實施台灣民主憲政的保證。雷震1955年1月8日的日記中寫到，此篇的文筆和思路不像出自高二生之手，《自由中國》也無法認同此一觀點，但是他基於中立的態度還是決定刊出此篇投書（傅正，1990）。

1956年在慶祝蔣介石七十大壽的〈祝壽專刊〉中，《自由中國》直言不諱的從各方面對蔣介石提出建言。在教育方面，羅大年（1956）發表〈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一文，將閱讀黨化教材以及救國團教育視為當時妨礙自由教育的兩大根本弊端。而這兩大問題相互重疊，嚴重干擾民主政治的建立。他延續了徐復觀在救國團成立前夕為文批判救國團妨礙教育正常化的觀點，強烈指出救國團成立三年多來的三大弊端：首先是強迫學生參加、違反民主教育；其次，救國團憑空成為上級主管單位干擾

學校行政，最後提及活動頻繁、開支鉅大，嚴重浪費國家公帑，羅大年因而呼籲需徹底改革救國團，讓學生回歸到正常的智德體三育的教學，做好學生的本分才能真正報國救國。專刊發行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以『周國光』（雷震自言，傳言此為蔣經國時任總政治作戰部的化名）為名出版了〈特字九十九號〉的特種指示，長達 61 頁〈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長文，全面批評《自由中國》的不當觀點，並指責其『為共匪鋪路』。在反駁救國團的部份，此文提出：一、救國團不但可以揭穿馬列主義的陰謀與暴行，同時也可以傳揚三民主義思想，向青年學生傳播正確的革命思想與觀念有莫大的貢獻；二、所謂的強迫參加違反民主教育以及干擾學校行政等根本為不實謠言，文中並指出台灣省 22 位中等學校校長賀翊新等的聯合聲明論及許多救國團在各校成立的支隊為同學自願成立，並且所辦的活動都主動配合學校行政，所舉辦的軍事訓練、愛國教育、戰鬥訓練以及體能訓練等各項措施都符合學生需求與興趣。三、文中捍衛國父遺教與總統訓詞的重要性。精讀兩者可以激發學子愛國愛民的思想，而且有助於日後反共抗俄革命的成功。文末還激動的指出『如果有反對研讀 國父遺教暨總統訓詞的，亦就是中華民國大逆不道的叛民，人人得鳴鼓而攻之，把他當作國民的公敵！』（雷震，1978：135）

即便羅大年的文章受到國防部的大力反擊，之後的《自由中國》並未因此而收斂，反而繼續加強對時事的批判。1957 年 3 月 1 日袁始〈大學教育的悲哀〉一文，以一個大學生的身份論述當前大學教育的缺點，其中提到救國團的部分，批判其主導的學生活動將學校組織變成黨派組織一般的運作，不但以黨中央對行政機構下令的方式命令學校按期召開分隊會議，更下令學生著制服、帶小旗、唱反共歌曲參加各種重大場合集會，並聆聽訓話動輒四五個小時；除此之外還將批判重點轉向軍訓課程的不當（袁始，1957：11）：

從高一到大學畢業要經過七年稍息立正的訓練，中學教材與大學教材幾乎毫無分別……大學畢業則需受預備軍官訓練，又從稍息立正開始。除掉浪費學生精力，解決大批職業軍官的失業荒之外，實無任何效果。

接著到 1958 年間，《自由中國》連續以『今日的問題』為主題，對政府在軍事、財政、經濟、政治、人權、教育等各類議題進行通盤的檢討（江燦騰、陳正茂，2008：109）。1958 年元旦出版的社論（1958a）〈今日的問題之十二：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中不再只是對救國團的運作提出建言，而是主張徹底的廢除救國團。這篇社論從根本的法律定位質疑救國團存在的必要性：首先，救國團是根據第九屆青年節總統所發表的『告全國青年書』中的指示而成立的，除了總統的文告外，在 1952 年 9 月經行政院直接定立台四一教之五二六五號訓令核準，根本是未經立法手續的法源而成立的政治性組織。再者，救國團的組織定位不明，一個區區隸屬於國防部的下層單位，舉辦活動之時竟然可以逾越單位權限，召集國防部、經濟部、陸軍供應司令部交通處警務處等各級單位全力支援其所舉辦的活動，實為破壞法制之舉；此外，救國團的活動有嚴重浪費之嫌疑，在全國大談節約開銷之際，救國團在 1956 年的開銷竟高達 3 億元左右；而軍訓課程的實施，聘用非軍校畢業，又無大學資格的教官教授課程。雖然根據救國團的解釋來看，軍訓在高級中等學校是預備士官的教育，在大專學校是預備軍官的教育，但是從高中到大學缺乏系統性規劃，既無統一規定的訓練發展進程，學科和術科的內容也無完備設計，學生在雜亂的課程中所獲得的知識不但有限，也毫無軍事訓練的成果可言。

學校軍訓即使有施行的必要，國內已經有各級的教育行政機構負責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動，何不由教育單位規劃執行軍訓課程？最後社論明白表示唯有撤銷青年救國團這個黑機構，才能免除學校行政受雙重指揮的惡果。此文延續之前浪費國帑以及妨礙教育正常化的批判意見，又加上了對於救國團的成立缺乏正當法源的致命批評，在此基礎上首次宣稱要廢除救國團。

下一期中有兩位讀者投書支持社論的觀點，其中一位大學生路狄君（1958）以標題〈青年團破壞法制與浪費國帑〉一文補充教官在校園內勢力的擴展，已經超越教授軍訓課的範圍，像是在數年前於教務、訓導、總務三長之外增加『副訓導長』一職，由軍訓總教官兼任。另外訓導處的生活輔導組組長也不再由大學教員擔任，而改由軍訓教官取代之，可見教官

職掌的權威已經擴張到對大學生生活與思想的控管，結語是(路狄君, 1958 : 75) :

總之在國家正常教育系統之外，另設於法無據的、黑市的、私人控制的(成立以來始終由一個人主持)青年救國團組織，浪費青年的時間精力，做無聊的事，開無聊的會，是千不該萬不該的。

另一篇由石柱(1958)所發表的讀者投書，則是宣稱在一次參加班級區隊的年終檢討會中聽到許多對救國團的批評：如入團並非志願、每回開會討論的問題或是發下的講義都是抽象的總統訓詞與國父遺教、採取無意義的填鴨式背誦等等做法，都讓救國團跟青少年有著巨大的隔閡。

在 1958 年 6 月 1 日的社論中，又以〈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1958b)為題發表，除了重申之前上一篇所言的法源不足之外，另外救國團在校內實施軍訓課跟兵役法的規定不合：依照兵役法第九、十兩條規定，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男生接受預備軍官教育或是高中以上學校畢業男生接受預備士官教育，皆須「依志願考選」，而接受預備軍官的期限除了教育期間再加上分發見習，最多也是 1 年 6 個月的時間。但是一個大專男生從高中到大學受過 7 年的軍訓訓練，畢業後仍然一概不予承認，必須從頭再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可見與兵役法之規定不合，也是養成預備軍官教育所不必要的。此文除再次重申無法源基礎與浪費公帑等舊由之外，又提出了一項撤銷救國團的重要理由：救國團實施學校軍訓和兵役法的規定不合。

下一期的讀者投書中路狄(1958)以『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同樣批判了軍訓課程的不當。除了呼應軍訓課的內容簡單不斷重複之外，更抨擊了政治課程內容空泛、任教的政工人員授課時錯誤不斷，只會用八股的方式訓斥學生，結果造成青年對政府不滿、失去信心。信末呼籲教官必須提升教學涵養，而軍訓課程規劃必須重新賦予現代化的內涵。

在 1958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社論〈認清當前形式，展開自新運動〉(1958c)中，自由中國重新衡估國府從遷台以來的反攻大陸政策，一來從東西德、南北韓以及南北越之分裂時，美國皆未積極介入，可得知美國雖然秉持一貫的反共立場，但也不想改變國際間巧妙的和諧平衡，所以無法寄望美國

幫助台灣反攻大陸；而就台灣本身的兵力來看，連陳誠院長也無從否認對岸的強大武力，在此情況下，《自由中國》建議台灣的唯一出路就是推展民主化的自新運動，方能開展出自由中國的前途。文中指出的具體改革措施是從軍事、教育以及文化上全面取消一黨專政的獨裁，在教育方面的革新是『取消黨化教育。各大學停止黨化課程，停讀黨化書刊』以及『取消浪費青年生命、製造個人勢力的青年反共救國團』。其中可看出所謂邁向民主改革的措施，就是取消管制，透過廣納不同意見，才能凝聚共同意志，並且透過政黨競爭與開放多元言論，才能促進台灣的進步，這些主張充分顯現出自由主義觀點下朝向開放與多元的精神。

在 1958 年的社論〈你要不要做人？〉（1958d）一文中，以聯合國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所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說明人類在維持生活方面要有基本的經濟人權，為了生活的基本保障，要有保有人身安全的人權，但是如果身為一個人要享有生存的意義與尊嚴，那麼就需要更進一步的政治人權了，包括言論、思想以及集會結社的諸般自由。以此文來檢視當時台灣的人權實踐狀況，就二十條第二款來說：『任何人不容強使隸屬於某個團體』，以加入救國團此事來說（1958：5）：

在我們這裡，成千成萬的青年，在大中學校入學的同時，於被指定填寫表格之間，無一例外的隸屬於青年救國團。這種入團手續，據說是「自願加入」，組織救國團的人說，凡有良心有血性的愛國青年都當加入，這一說詞反面的意義陰影好像是說：「凡不加入青年救國團的青年就是無良心無血性而又不愛國的青年。」誰個青年敢做「無良心無血性而又不愛國的青年」呢？因此你如怕背「無良心無血性而又不愛國的青年」之名，那就只有加入青年救國團了。

社論中嚴詞批判此舉不但違背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二十條第二款，同時也違背宣言中第二十六條第二款所言：教育的目標在於充分發展人格，加強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台灣教育的目標，是把下一代製造成一黨工具呢？還是「充分發展人格」？』（1958：5）。除此之外，因為要符合黨的政策，讓人民隨時暴露在警察權力的掌握中，監控人民是否有任何不利於政府及黨政策的想法，大家只好人人自危，退縮行事。本文指出，國

民黨政府慣以非常時期的藉口，說明大家必須凝聚一致的反共信念，在此前提下必須先行犧牲自由。這樣的理由並不為《自由中國》的立場所接受，因為人權不應受限於特定的時空地點。再者，社論中強調國民黨政府一貫堅持反共的立場，但是反共應該是為了保衛人權，如果宣稱保衛人權，卻放棄了人權，這豈不落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1954 年杜勒斯來台和蔣介石簽訂中美聯合公報，其中表示，今後自由中國的使命將以和平的方式達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認為這代表我國和中國關係新的起點，蔣總統也強調日後武力反攻不再是重點。在此背景下，《自由中國》從 1957 年 8 月 1 日後陸續發表『今日的問題』系列文章，在反攻大陸的觀點上表達要從軍事第一轉為政治第一，以推動民主政治持續進行實質反共的工作。到了 1959 年 1 月，以社論『取消一黨專政』大力抨擊國民黨政府不但沒有推行民主政治，反而怕人民覺醒，推行黨化教育，以革命教育的名義灌輸黨的教條、從兒童開始即被塑造成國民黨的黨員，政府又怕黨化教育實施的不夠徹底，假借推行軍訓成立青年救國團，取代學校原有的訓導工作，力求對高中以上的學校教育落實根本的控制。最終的目的，企圖使得全國的青年學生，都成為國民黨的政治資本。如此一來，使得教育嚴重地違背了民主反共的方向。

1960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規定：「高中以上學校軍訓工作，劃歸教育部軍訓處辦理，並將原在救國團工作的有關軍訓人員，全部併入教育部」（薛化元，1996a：288-89），此一規定使得軍訓課程改由教育部接管。此一改革可能和 1957-1960 年間《自由中國》不斷發表社論批判軍訓課的不當有關。稍後，《自由中國》發表社論〈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文中進一步質疑的是：如果軍訓已經劃歸教育部來主管，那麼救國團還有什麼繼續存在的理由呢？社論中找到救國團在 1958 年 2 月 5 日公開發表的告全體團員書提及，『行政院為實現文武合一的教育政策，培養術德兼備的優秀人才，乃令頒台灣省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軍訓實施辦法，限令高中以上學校學生，一律接受在校軍訓，並規定由國防部成立救國團，負責實施學校軍訓』（社論，1960：3）。如此一來，救國團的成立是為了實施學校軍訓課，如今軍訓課轉移到教育部統管，卻又不撤銷救國團，《自

由中國》認為唯一的理由是『掩護國民黨當局製造國民黨的預備隊，甚至如同國民黨的若干權要所說：這是幫助國民黨的當權派做增加私人政治資本的工作』（社論，1960：4）。

綜上所述，從1952年起《自由中國》即在救國團成立前夕由徐復觀發表對救國團此一單位成立之質疑，然而此時只是提出對領導者的身份以及成員參與方式改革的建言。1957年由一名大學生袁始透過親身體驗大力批評了軍訓課程的不當，之後對軍訓課的批判成了《自由中國》批判救國團教育的核心，到了1958年元旦由羅大年正式提出撤除救國團的強烈立場，並相繼提及救國團成立的法源不足、浪費公帑以及強迫灌輸黨化思想的諸多弊端，甚至在1960年當行政院將軍訓課程轉交教育部處理之後，《自由中國》仍然堅持救國團應予撤除的強烈立場。從1952到1960年諸多文章所發表的觀點可以感受到，《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設立與運作上由委婉建言到強烈抨擊主張撤除的立場轉變。

肆、評析

《自由中國》在多篇對於救國團的論述中，將之視為國民黨政策的貫徹以及延續國民黨政權的工具。其中對於救國團的批判始於1952年的籌備期間，一直到成立初期，只有針對如何讓救國團的運作趨向正常而婉轉的提出建言，1958年後，才正式提出撤除救國團的強烈意見。

《自由中國》對救國團的批判是否在當時發揮了影響力？1950到1960年代，台灣校園幾無異議的聲音，這和救國團在校園的滲透、教官和訓導處相互結合管控學生言行有重要關聯（漆高儒，1997：87-88）。甚至到了70年代，在國民黨的掌控下，台灣校園也未曾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學生運動（鄧丕雲，1993：20）。李偉松（2005：114）將之稱為救國團在台灣發展對於社會穩定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不過這樣的和諧只是表象，充其量只能說救國團對於青年的思想與意識型態的掌控是頗具成效的，它導引了大多數青年學子循著國民黨的模式進行政治思考，沈浸在其所帶來的逸樂文化，讓大學生對於深層的社會政治議題不感興趣（楊憲宏，1987）。由此

來看，《自由中國》所發出的聲音是微弱的，對當時的校園與學生文化似乎發揮不了作用。

不過，研究者認為可從兩方面觀察《自由中國》的影響力：

一、《自由中國》是批判救國團教育的先鋒

從教育史研究的脈絡來看，《自由中國》可說是救國團教育的批判先鋒。關於救國團的相關研究（武奎煜，1970；黃淑惠，1975；古道中，1985；陳忠慶，1980；陳耀宏，1993）多從肯定救國團對高中以上學生進行政治社會化的角度著手，而對於救國團的批判文章甚少。《自由中國》在 50 年代是重要的批判先鋒，當時還有一位對救國團的強烈批判者是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吳國禎。他（1995）對於蔣經國在軍隊設立政戰制度以及成立救國團之事甚為不滿，1953 年辭去省主席的工作後即滯留美國，並且在 1954 年 3 月 27 日致函國民大會表達其對政府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到救國團的成立是模仿極權組織的作為，目的是控制青年人的思想，並建議國民大會撤銷救國團，並且不再容許任何變相組織的成立；1960 年代的孫家麒（1961：51）則從蔣經國建立國民黨特務系統的角度著手，批判以蔣經國為首的救國團，舉辦暑期青年活動的真正動機，是為了接近年輕學子，透過活動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培養他們的向心力，以便於掌握與控制年輕學生為己所用；80 年代之後有彭明敏（1988：135）嚴厲批判國民黨透過救國團強烈對青年進行意識型態的掌控。縱觀這些批判的文章，只有 50 年代的《自由中國》反省的角度最廣，從救國團強迫人人參加灌輸黨國意識型態違反民主教育的原則、使用龐大的經費、軍訓課程實施不當、成立法源不足等面向進行全面的批判，奠定了對整個黨化教育的反省基礎。

二、《自由中國》對 1960 年代初期的軍訓課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對救國團教育的批判，除了從救國團的定位、經費與思想控制等角度切入，對軍訓課的實施也是一大批判重點，著重的是對其實施內容的重複性、時間太長、設備和教官素質不良的批評。從 1957 年 10 月起，救國團內部陸續針對軍訓的實施提出改革構想，在幾次邀約教育部、國防部與高

中職校長等相關人士座談後，擬定了『學校軍訓教育改進計畫大綱』，改進作法主要為：簡化課程、縮減時數、改進教學方法與提高幹部素質等，以不脫節與不重複為目標。1959年1月，救國團邀約台大校長與教授進行座談，會中的教授們表示，軍訓課內容與實施情況既然已經改進甚多，可以進一步建立軍訓課程的永久性制度，後續也有多位監察委員有同樣意見（李泰翰，2011：322）²。在這些意見下，1960年7月1日行政院正式將軍訓課程的主管從救國團移轉到教育部，雖然總團部內的文獻（1988）只簡單提及『鑑於軍訓教育的實施已奠定基礎，為符合教育體制，乃奉核定將學校軍訓業務移請教育部接管』。此一將軍訓課從救國團轉移到教育部的改革，猜測推動改革的因素大約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來和民間各種反對的聲浪有關，而各種反對意見都在《自由中國》從1957-1960年間批評軍訓課的文章出現過，《自由中國》可說在當時扮演了關鍵的批判角色；二來在政治方面可說是受迫於美方的壓力（薛化元，1996：141-42、209）：1957年有位美國軍人槍殺劉自然被美軍法庭宣判無罪，此舉引發群眾衝入美國大使館抗議，當時有諸多傳言指出抗議者多數由救國團所發動，美國駐台大使藍欽（Rankin）也因此促使我國政府撤銷救國團。雖然救國團未能撤銷，但是至少促進了軍訓課程回歸教育事務的層面。

可見，《自由中國》的批判雖然未能改變當時校園與學生的文化氛圍，然而其對救國團的批評在教育史研究的脈絡裡就是前導的異議之聲，持續不斷的批判也有助於促成1960年軍訓課的改革。

不過，值得進一步省思的是救國團教育與《自由中國》兩者背後的意識形態：前者代表了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以黨國合一的精神，用黨意引領國家，奠定國民黨在中華民國的獨大地位，為此，國民黨政府進行媒體與教育上的思想掌控，使人民服從黨意成為國民黨統治的重要根基；而《自由中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呈顯了個人自由優於國家自由的觀點，國家是為保障個人利益而存在，不得以國家處於非常時期的狀態剝奪個人自由，此一走向承襲了從洛克以來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也因

² 關於救國團對於軍訓課程詳細的改革歷程，可參考李泰翰（2011：303-323）。

此，《自由中國》主張國家不得當擴權、妨礙個人自由，亦即，《自由中國》所提倡的自由屬於一種不受干預的消極自由（吳叡人，2007：63-64；薛化元，1995：133-38；錢永祥，2001：184-85）。延續著限制國家自由以保障個人自由的政治觀點，《自由中國》在教育上呼應了政治的批判觀點，同樣以一種不得限制個人自由的消極觀點來論述教育。

以此來檢視從 1954 年余燕人的投書以來，即著力在批評救國團傳遞一黨的政治意識型態，並且挪用大量時間迫使學生參與政治活動以及閱讀黨化教材都違反了教育正常化的精神。甚至羅大年（1956）提到最重大的教育弊端在於救國團主導的黨化教育佔用了正常教學的時間。當這些作者在呼籲減少黨化教材的閱讀與考試時，只是期待學生可以去除不必要的束縛，回歸教育的正常化。如果拿《自由中國》裡對教育的批判文章一起來看，《自由中國》中一貫對教育的批判，都著眼於去除思想上的掌控，延續政治層面上消極自由的意義，提到限制個人思想自由對個人、對社會所造成的諸般惡果：不但扼殺青年人獨立思考的能力、箝制了學術發展，甚至會讓台灣變成『黨即國家』的封閉社會（社論，1958b：3-6）。然而探討教育受到不當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固然有助於推動教育的民主化，但是教育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透過教育幫助人類從依賴性中解放（Joch, 1971: 16）。我們可以思考的是，當教育的首要目標在於瞭解社會非理性的束縛，如此會偏忽自由的積極意涵。在教育中除了要避免對學生有過多的掌控與限制，幫助學生發展獨立自主的人格，並且開展其人性中有待創造的積極條件，同樣是不可或缺的³（Giesecke, 1972: 199; Kerstiens, 1974: 60; Kreis, 1978: 177; 張淑媚，2008；2013）。

伍、結論

³ 德國在 1960 年代興起的批判教育學，從自身的納粹歷史進行深刻的反省，因而特別著重在對威權結構的批判以及追求教育上的解放，這與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發展中批判一黨獨大追求教育民主化的批判重點有所雷同。然而在 1970 年代後德國教育學界陸續對批判教育學的取向有所省思，認為光批判政治對青年學子思想所造成的束縛，會導致對教育實質概念的模糊不明，亦即政治上的解放和教育的解放範疇不同，因為外在社會制度的解放不等同於個人發展出成熟的獨立思考能力。詳見張淑媚（2008）。

總結上述，救國團教育從 1950 年代以來成功的掌握了青年學子的政治意識型態，帶來了社會穩定成長的和諧假象。而《自由中國》雜誌以一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力量，在 1950 年代奠定對於救國團教育的批判基礎，深刻的省思了當時的教育如何受到政治力的不當影響，它的批判在 60 年代，最明顯的成效呈現在 1960 年 7 月軍訓課程改由教育部主管。然而，《自由中國》延續著政治上簡化的政治觀點，對於救國團教育的批判，以黨國一體的意識型態妨礙個人思想自由為重心。此種論述方式固然指出了當時教育受到意識型態的不當宰制，有推動教育民主化的貢獻，但是消極的論述教育的受限，卻忽略了論述教育的積極層面在於發展人格陶冶的實質內涵，此為可惜之處。

參考文獻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1966。《本團重要文獻第一輯》。台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1969。《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工作概況簡介》。台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1982a。《三十年團務誌要》。台北：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
- 王佩玲，2001。《環境演化與救國團之組織變遷——救國團 1987 年至 2001 年》碩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古道中，1985。《中國青年政治社會化之研究——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自強活動個案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
- 石柱，1958。〈年終檢討會上〉《自由中國》18 卷 2 期，頁 30。
- 江燦騰、陳正茂，2008。〈五〇年代臺灣組黨運動之重挫：記胎死腹中的中國民主黨〉《北臺灣科技學院通識學報》4 期，頁 107-24。
- 余燕人，1954。〈搶救教育危機〉《自由中國》11 卷 12 期，頁 32-33。
- 吳國楨，1995。〈吳國楨上國民大會〉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下冊)頁 550-53。台北：自由時報出版社。
- 吳叡人，2007。〈自由的兩個概念——戰前臺灣民族運動與戰後《自由中國》集團政治論述(下)〉《當代》235 期，頁 60-75。
- 李偉松，2005。《蔣經國與救國團之研究(1969-1988)》碩士論文。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李泰翰，2011。《1950 年代台灣學生軍訓之研究》。台北：國史館。
- 林玉體，1987。《師生之吼》。台北：敦理。
- 林淇瀆，2005。〈威權／霸權與新聞自由權——以 1950 年代「自由中國」的言論苦鬥為例〉《臺灣史料研究》24 期，頁 25-51。
- 武奎煜，1970。《對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推行中上學校假期青年育樂活動之調查分析》碩士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 社論，1952。〈對於我們教育的展望〉《自由中國》7 卷 6 期，頁 3-4。
- 社論，1958a。〈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今日的問題』之十二〉《自由中國》18 卷 1 期，頁 5-7。
- 社論，1958b。〈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18 卷 11 期，頁 3-6。
- 社論，1958c。〈認清當前形勢，展開自新運動〉《自由中國》19 卷 8 期，頁 3-6。

- 社論，1958d。〈你要不要做人？〉《自由中國》19，11期，頁3-5。
- 社論，1959。〈取消一黨專政〉《自由中國》20卷2期，頁3-5。
- 社論，1960。〈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自由中國》23卷5期，頁3-4。
- 金石允，1986。《從依從關係探討救國團組織特性》碩士論文。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胡茹涵，2005。《台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年）》碩士論文。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 茅家琦，2003。《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台北：台灣商務。
- 孫家麒，1961。《蔣經國建立台灣特務系統秘辛》。香港：自印。
- 徐復觀，1952（2003）。〈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自由中國》7卷8期，收於潘光哲（編）《自由中國選集六——黨國體制的批判》頁201-209。
- 袁始，1957。〈大學教育的悲哀〉《自由中國》16卷5期，頁10-12。
- 張光輝，2003。《戰後初期的國民學校教科書分析（1945-1963）——以反共抗俄教育實踐之探討為中心》碩士論文。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
- 張忠棟，1990。《胡適、雷震、殷海光》。台北：自立晚報社。
- 張忠棟，1990。〈遠離權力核心的雷震〉《當代》47期，頁54-69。
- 張瑚玉，1955。〈有感於搶救教育危機〉《自由中國》12卷2期，頁30。
- 張淑媚，2008。〈評析德國教育學者 Klaus Mollenhauer (1928-1998) 的批判教育學思想〉《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卷1期，頁129-50。
- 張淑媚、蔡元隆，2013。〈評析《自由中國》雜誌對戰後初期的黨化教育之論述〉收於陳翠蓮、川島真、星名宏修（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第五集》頁497-517。台北：稻鄉出版社。
- 梁中銘，1954。《我們偉大的領袖》。台北：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 小山三郎講（許菁娟譯），2003。〈知識分子的政治與文學——《自由中國》對於臺灣現代文學的一個視點〉《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6期，頁18-26。
- 郭紹儀，1988。《蔣中正與青年》。台北：幼獅。
- 傅正（編），1990。《雷震全集——第34冊》。台北：桂冠。
- 彭明敏，1988。《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台北：前衛。
- 黃俊騰，1994。《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建築之研究》碩士論文。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 楊憲宏，1987。〈呼吸著充滿反叛與反省的空氣——我看台灣學生運動的過去與未來〉收於林玉體（編）《師生之吼》頁99-106，台北：敦理。
- 賈嵩麓，1974。《蔣總統革命思想》。台北：黎明。

- 路狄，1958。〈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自由中國》18 卷 12 期，頁 30。
- 路狄君，1958。〈青年團破壞法制與浪費國帑〉《自由中國》18 卷 2 期，頁 75。
- 雷震，1978。《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集》。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
- 漆高儒，1997。《蔣經國的一生》。台北：傳記文學。
- 潘光哲，2003。〈透視黨國威權體制的歷史窗口〉收於潘光哲、陳儀深（編）《黨國體制的批判》頁 vii-xxxvi。台北：稻鄉出版社。
- 鄧丕雲，1993。《80 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台北：前衛。
- 薛化元，1996a。《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板橋：稻鄉出版社。
- 薛化元，1996b。〈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60）：以反對黨問題為中心〉《思與言》34 卷 3 期，頁 241-86。
- 薛化元，1996c。〈《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臺灣史料研究》8 期，頁 123-36。
- 鍾聲，1984。《蔣總統經國先生：平凡平淡平實的世界偉人》。台北：立坤。
- 顏淑芳，1989。《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政黨思想》碩士論文。台北：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
- 錢永祥，2001。〈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縱欲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理的政治倫理》頁 179-236，台北：聯經。
- 魏誠，1984。《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碩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新聞所。
- 羅大年，1956。〈建立自由教育必須剔除的兩大弊害〉《自由中國》15 卷 9 期，頁 34。
- Giesecke, Hermann. 1972. *Didaktik der politischen Bildung. Neue Ausgabe.* München: Juventa.
- Joch, Winfried. 1971. *Theorie einer politischen Pädagogik.* Frankfurt: Peter Lang.
- Kerstiens, Ludwig. 1974. *Modelle emanzipatorischer Erziehung: eine Zwischenbilanz; Voraussetzungen, Entwürfe, Kritik.* Bad Heilbrunn: Klinkhardt Verlag.
- Kreis, Heinrich. 1978. *Der pädagogische Gedanke der Emanzipation in seinem Verhältnis zum Engagement. Untersuchungen zu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n Konzeptionen Klausmollenhauers, Hermann Gieseckes und Klaus Schallers.* Bad Heilbrunn: Klinkhardt Verlag.

The Education of China Youth Corps: A Critic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ree China* (1952-60)

Shu-Mei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Abstract

China Youth Corps was founded by Chiang Kai-shek in 1952. Its establishment has aroused great disputes. The journal *Free China*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many critical commentaries written by liberalists against the education of China Youth Corps. These liberal thinkers criticized China Youth Corps for violating democratic ways of education, for wasting public expenditure and for conducting inappropriate military educ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ir comments about China Youth Corps and to find out their deeper meanings in the larger context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education.

Keywords: China Youth Corps, *Free China*, military education

